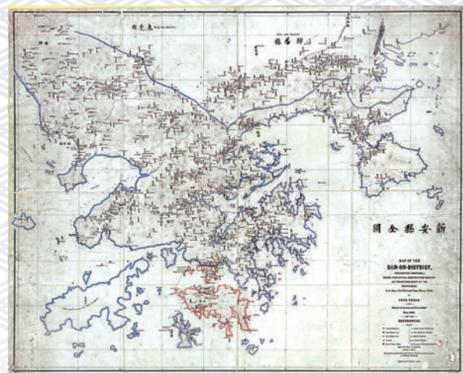


地方百科全書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醞釀多年，歷經艱辛，令人翹首以待的香港地方志，終於在去年年底出版了第一部《香港志》首冊《總述 大事記》，獲得社會正面回響。昨日，香港地方志中心於香港書展舉辦主題講座，多位香港本地專家學者以「《香港志》的歷史意義和責任」為題，從尋根、記錄、承傳的角度，講述編修地方志的意義及責任。

大公報記者 劉毅（文、圖）



▲劉智鵬（左起）、梁元生、李焯芬、冼玉儀、陳坤耀活動後合影。
▲1866年新安縣全圖證明香港自古與祖國的關係。香港地方志中心

第二冊120萬字記錄港人參與國家改革開放

《香港志》修志育人 細說7000年發展歷程



放▶《香港志》第二冊《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專志年底問世。大公報資料圖片

編修《香港志》是一項巨大的史學工程，整個香港地方志共計66卷，預計於2027年完成，超過200名專家學者以不同形式參與並支持這項工作。首冊《總述 大事記》共774頁，記錄了從公元前5000年先民活動到香港回歸20周年的這7000多年間，香港歷史的變遷和6000多件大事件。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李焯芬表示：「地方志的修訂關乎中華文化傳承。」

李焯芬介紹，未來全部《香港地方志》涵蓋66卷，共計2500萬字。為何要在香港堅持編修地方志？他認為，原因包括：「其一是在存史，地方志可以詳細記錄一個地方上發生的事情；其二是資政，可為管理一個地方提供參考。」為了令大家更加形象了解，他還幽默道：「就好比你去加州定居，去查一查地方志，就會知道這個地方歷史上就多地震，怎能不買地震保險？」

他補充編修地方志的另外兩大意義——育人和研究，前者顧名思義，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後者則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參考，得出與之

前完全不同的結論：「地方志包羅社會上發生的方方面面的事。佛經曾記載六祖慧能不識字，言下之意家境不好。饒宗頤於1980年代去廣州新興查看地方志，發現他們家有很大的家產，不會窮到沒有機會讀書。」

為香港歷史正名

萬事開頭難，由頭開始做。「但為了讓更多人明白香港歷史流傳過程、社會演變經過，修志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冼玉儀分享自己學生時代學習歷史的經歷，感到編修地方志可以為香港歷史正名，關乎現在和未來，「通過修志，繼而明白未來的路該如何走，將去往何方。」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及研究教授梁元生，很開心香港終於有了自己的地方志，「我曾去過多個地方的圖書館，館內都會有一個比較顯眼的位置擺放一排排地方志，如今香港也有了自己的地方志，讓我更加了解這個我出生的地方。」他亦提及上海設有上海通志館，此可成為香港修志的借鑒經驗，「館內收

藏大量有關地方志的文獻資料，譬如當時政府的官文、民間記錄，甚至是外國人留低的文章，林林總總就形成了以地方志為基礎的「上海學」。

「國有史，地方有志。志不是史，一般人不可以修史，而地方志則是將一個地方發生過的事情做盡可能詳盡的記錄。」香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外關係）劉智鵬解釋「史」、「志」之分：「正史不可能似地方志一般事無巨細地記錄，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正史中找不到的人物，可以通過地方志去查其曾落腳何處、都去過什麼地方旅行。」

首冊將推出英文電子版

《香港志》第二冊《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專志將於今年12月出版，涵蓋經濟、金融、文化及社會四大範疇。專志主編之一、香港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在講座現場介紹，《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專志是香港首本完整及翔實記錄香港人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志書，全書共計120萬字，記述自1978年12月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既是「見證者」、「參與者」，也是「受益者」和「貢獻者」。

「十幾年前，我就有了編修地方志的念頭。」陳坤耀憶述：「改革開放時期，香港為內地貢獻了資金、管理經驗和技術，深圳今日的高速發展亦與香港有關。我自己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改革開放期間，分享西方經濟學知識及管理經驗，親身見證其發展脈絡。」而第二冊《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聚焦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全過程，「我相信它會成為一部發展中國家都應該看的書。」

另外，《總述 大事記》英文電子版將於今年年底出版，是中華民族史上首次有英文版本的地方志。



▶「《香港志》的歷史意義和責任」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記者手記

昨天的香港書展現場，人流湧動，記者行至現場外的行人天橋，排長龍的隊伍令人「望隊興嘆」，天公又落大雨，3號風球旋即掛起，但這無礙觀眾聆聽「《香港志》的歷史意義和責任」講座的熱忱，講座現場有150多人，遲進場的觀眾幾乎找不到空位。

講座時大家聽得認真，發問環節亦見踴躍。有觀眾問到，如今的《香港志》與古代「方志」有何不同？李焯芬回答：「區別就在於，我們今日編修《香港志》並非由官方主導，而是民間編修、學術界指導。」

昨日講座結束後，大公報記者問及觀眾之一、也是香港地方志中心總裁林乃仁，如何在編修時收集第一手資料？況且香港也從來沒有過地方志？林乃仁答：「我們會參考政府及民間的相關文獻記載和資料、口述歷史，大公報、文匯報等香港本地報章我們都會看，以及一些考古類書籍。每寫一個字，這背後就有100倍的文字信息資料，如此才能編成這部香港的『百科全書』。」

現場亦有不少年輕人身影，市民于小姐表示，自己正在做一個有關香港民間風物、旅遊文化的研究，《香港志》是很重要的參考來源。

大雨滂沱 觀眾熱忱不減

大公報持續關注地方志編修

話你知

香港地方志的編修得來不易，大公報近年也一直關注並報道本地地方志編修情況，提升廣大市民關注度，在社會上引發不俗反響。

2017年，時逢清嘉慶《新安縣志》重刊發行，大公報即展開系列專題報道，提

出新安縣與香港的關係，其實書中內容有不少都可成為香港地方志重要資料。並藉此發問：為何內地與台灣皆有地方志，香港編修地方志為何舉步維艱？繼而邀請一眾專家學者，解難答疑深度剖析，指出香港修志的重要性。2018年初，大公報亦連續3天在報紙頭版推出地方志系列報道。

「敦煌女兒」一生成就源自於心

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香港中和出版。



「我心歸處是敦煌」講座近日在香港書展期間舉行，撰寫《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的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以視像現身「名作家講座」，與讀者見面，分享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獲譽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保衛敦煌50餘年的所見所聞。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發起人及榮譽團長紀文鳳也現身講座現場，分享在敦煌與樊錦詩會面的經歷。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文、圖）



樊錦詩未能親臨現場，以視頻方式參與講座。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簡體版2019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繁體版去年由香港中和出版發行。

顧春芳講解道，該書展現樊錦詩堅守大漠、守護敦煌、向世界展示中國傳統藝術之美的動人故事，既有她的事業與愛情、困境與堅守，亦解讀敦煌藝術之美，展現莫高窟「申遺」及「數字敦煌」背後的故事。

今年83歲的樊錦詩以錄製視頻方式與讀者見面。她說：「該書受到內地、香港、台灣及海外華人讀者的喜愛令我由衷高興，可見廣大讀者對敦煌文化藝術的熱愛，也是對近80年來敦煌石窟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的肯定。」

顧春芳撰寫該書歷時4年，她與樊錦詩兩人已成為摯友。顧春芳這樣形容樊錦詩：「她追求獨立人格，亦為我們展示了人如何面對磨難，獲得智慧和勇氣，找到力量。她的性格單純深厚，深沉甜美，如今80多歲，笑的時候還是像孩子一樣純真。生活樸素的她，一件衣服能穿幾十年，她的一生成就都源自於心。」

敦煌在中國 敦煌學在世界

顧春芳說，寫作樊錦詩的傳記她必須了解敦煌的學術史，但並非寫敦煌的學術史，「我要寫的是一個對敦煌學的方方面面有廣泛研究並一生踐行的文物保護學者的心靈史。」

顧春芳亦稱，經過多位中國學者數年來的辛苦努力，敦煌研究已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變成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局面。

紀文鳳稱，樊錦詩對青年愛護有加。她提到2018年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到敦煌演出，「那時樂團只成立了4個月，加上我們知道樊錦詩習慣早睡，不想驚動她，沒想到她晚上7點55分準時出現在演出現場，給我們支持和信心。」

紀文鳳曾組織香港的中學老師到敦煌考察學習時，樊錦詩親自講課，「當時77歲的她一講4個小時。我問，您不累嗎？她說，我希望他們回香港後以教學讓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

相識未名湖 相守莫高窟

樊錦詩生於北京，成長於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1962年，經學校安排，她和幾名同學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實習，畢業時研究所向學校要人，她便再赴敦煌。

「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老彭）是大學同學，兩人的婚禮是1967年在大學宿舍簡單舉行的。」顧春芳說，「婚後他們兩地分居，直至1986年，老彭放棄了在武漢大學一手創辦的考古專

業的事業，調至敦煌研究院，才結束了19年的分居生活。」

在敦煌的日子裏，他們相伴相依，更作出諸多研究，比如樊錦詩與敦煌研究院同事編著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等，彭金章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等。2017年彭金章逝世，留給樊錦詩無盡想念，「她依然會到敦煌九層樓附近散步，只是身邊沒有了老彭。」顧春芳說。